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八)

Occasional Paper No.8

「東亞漢字文化圈」

各國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ICTIONS IN COUNTRIES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李時人 著

By Li Shiren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八)

Occasional Paper No.8

「東亞漢字文化圈」
各國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ICTIONS IN COUNTRIES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李時人 著

By Li Shiren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編輯委員會**

顧問：饒宗頤教授、李焯芬教授

主編：鄭焯明博士

執行編輯：龔敏博士

助理編輯：羅慧小姐(兼秘書)、陳德好小姐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 Professor Jao Tsung I, Professor C F Lee

Chief Editor : Dr Cheng Wai Ming, Peter

Executive Editor : Dr Kung Man

Assistant Editors : Miss Luo Hui (Secretary), Miss Chan Tak Hou

作者簡介

李時人，男，漢族，1949年生於遼寧錦州。現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兼博士點負責人。

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學術方向主要為「中國小說與文化」、「明清文學」。學術研究工作始於文獻考據而長於理論思維和論辯，治學主張遵循「求實、創新、循序漸進」的原則。出版有各類學術著述十餘部，發表論文逾百篇。曾獨立編校斷代小說總集《全唐五代小說》五冊出版，被譽為「文化積累工程」。

About the Author

Li Shiren was born in Jinzhou, Liaoning in 1949. He is presently Professor at the Humanities College, Director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Doctoral supervisor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Doctoral Supervisors Board 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rof. Li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fiction and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ten books and over a hundred papers. Particularly, he has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five-volume *Fiction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Project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for China.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八)

「東亞漢字文化圈」各國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

李時人 著

© 李時人 2009

出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大學大學道2號2樓；電話：2241 5598)

印刷：藝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4樓D座)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2009年3月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No. 8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ictions in Countries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By Li Shiren

© Li Shiren 2009

Published by: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F, No.2 University Drive, Hong Kong; Tel: 2241 5598)

Printed by:
Standartprint Co. Ltd
(4D Sunview Industrial Building, 3 On Yip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March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author.

ISBN 978-988-17777-2-0
Printed in Hong Kong

內文提要

本文主要以「東亞漢字文化圈」各國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為考察和論述的對象，本文認為：中國古代的「文言小說」主要淵源於「史傳」及其衍流雜史、雜傳、志怪書等，而「白話小說」則發端於唐五代寺廟和宋元都市之「講唱」，至明清出現了白話小說的全盛。越南古代散文體小說基本上是「漢文小說」，其發生、發展深受中國小說之影響；朝鮮半島的古代小說亦以「漢文小說」為大宗，無論是「漢文小說」，還是「諺文小說」都深受中國小說的影響。日本古代小說的發軔之作可追溯到10世紀的漢文小說《浦島子傳》，其「早熟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借助了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的積累和受中國古代小說傳入的影響。「東亞漢字文化圈」各國古代小說的繁盛，是古代東方文學曾經高度發達的見證，頻繁的文化交流則是促進各國文學發展的重要原因。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ictions in countries with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The author holds that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authoritative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s well as underground histories, unofficial

biographies, and books of supernatural stories, whereas its vernacular form were originated from performing literature prevalent in temples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the citie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w the golden age of the literary form.

Vietnamese classical prose-form fictions were basically written in Chinese and rooted in China. The case was similar in Korea, where fictions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were largely inspired by fictions from China. *Pu Dao Zi Zhuan*, born in 10th century and regarded as the oldest Japanese classical fiction, was also written in Chinese. The preceding start of fiction development in Japan had to a large extent been caus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narrative ar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The flourish of classical fiction 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showed that oriental literature had been highly developed. Freque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countries were vi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sphere.

第一節 導言

19世紀的法國小說家巴爾紮克曾將「詩歌」說成是人類「童年」的藝術，而將「小說」說成是人類「成年」以後的產物¹。這應當是一個既符合歷史，也很形象的說法。確實，散文體小說是敘事文學的最高形式，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敘事藝術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此為世界範圍內文學發展之規律，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概莫能外。

歐洲各國的散文體小說在14至16世紀「文藝復興」之際興起，並逐漸在各國取得了文學的「長子權」，至19世紀達到創作的高峰。而隨着近世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經濟、政治、軍事的強勢，西方文學，特別是歐洲的小說亦大量輸入世界各地，從而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文學發展的格局和方向，以致使這些地區文學以往的歷史都在西方文學的遮蔽下顯得暗淡和模糊起來。本文以「東亞漢字文化圈」內若干國家和地區「古代小說」的淵源形成以及發展情況為考察、論述的對象，希望能為世界的「多極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一些遙遠的和一些並非遙遠的歷史記憶。

本文所說的「東亞」，是一個兼顧地理、歷史和

¹ 〔法〕巴爾紮克〈論歷史小說兼及《弗拉戈萊塔》〉：「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具有不同的年齡，沸騰的童年是詩歌，史詩是茁壯的青年，戲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轉引自王秋榮編：《巴爾紮克論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55頁。

文化的概念，主要包括中國、越南、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²，地域範圍與一些現代西方學者的說法基本相合³。之所以取「漢字文化圈」的概念，則因為除了其他特點之外，古代「東亞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以「漢字」作為相關國家和地區之間文化關聯的主要媒介，正如日本史學家所說：「古代東亞文化圈的特徵之一，是漢字和漢文化的擴展。」⁴而文字不僅是「文化」的載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某種「文明」的標識。

² 兼顧地理、歷史和文化各方面看，「東亞」應該包括今天被一些人稱為「東北亞」、「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

³ 〔美〕費正清、賴肖爾、克雷格等提出，「東亞」包括地理、人種和文化三層含義，地理上指受崇嶺和大漠阻隔的東部亞洲地區；人種概念指蒙古人種居住區，文化概念則主要指淵源於古代中國的文明圈，包括中國、越南、朝鮮半島和日本在內，並認為「東亞就是『中華文化圈』」。見〔美〕費正清等著，黎鳴等譯：《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頁。

⁴ 〔日〕上田正昭：〈漢字文化的接受和展開〉，《古代日本和渡來文化》（東京：日本學生社，1997年），第12、13頁。

「神話傳說」也逐漸被「歷史化」，使層出不窮的散文體史書，不僅成為對民族歷史進程的記憶，也成了民族敘事藝術積累的主要載體。在文學領域，則是緣情言志的抒情詩遠比敘事詩發達，長期高居文學的主流位置。這一切都導致了中國古代小說的形成道路與歐洲的不同。

西方的小說史在追述小說形成沿革時，無不把古希臘史詩，即人們常說的「荷馬史詩」——以神話傳說、部落戰爭為內容的長篇敘事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認作小說的始源。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不僅如此，在此之前已有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的史詩以及古埃及神話作為希臘史詩的前導——圍繞地中海這個小池塘的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和希臘文化是很容易交流的。當然，「荷馬史詩」就其規模的宏大和內容的繁富來說，更可被稱為近世西方小說的原始「範本」——馬克思說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⁶。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文藝復興」以後歐洲人的「尋根」。

「蠻族」的入侵，基督教文化對希臘、羅馬文化的覆蓋，使西方近世小說與古希臘史詩之間的聯繫顯得很模糊。能夠確證是西方小說直接淵源的，實際是12世紀以

⁶ 〔德〕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50頁。

來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騎士敘事詩」(romance)⁷——一種敘述騎士荒誕不經的冒險生涯和古怪迷人愛情的長篇敘事詩（或稱為「騎士傳奇」,或音譯為「羅曼斯」）。在此之前，則有歐洲各民族的「英雄傳奇」（或稱為「民族史詩」）作為先導⁸。當romance這種主要由八音節詩句組成的敘事詩逐漸向「韻散相間」轉化，散文體小說才初見端倪。後來歐洲的多種語言（如法語和德語）的「長篇小說」一詞在語源上可以追溯到romance，正是語言對這一文學演進事實的記錄。

不管希臘史詩、歐洲各民族的「英雄傳奇」和騎士敘事詩實際上是否一脈相傳，西方文藝復興以後出現的散文體小說確實主要是由長篇敘事詩孕育的，這其中儘管有從韻文到散文的轉化，但總的說來仍然是文學內部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因為有了長篇敘事詩作為「典範」，也使歐洲散文體小說以長篇為主流的特點顯得十分突出。「文藝復興」以來在「人文主義思潮」激

7 「Romance」，原指四世紀後在古羅馬內部通行的「羅曼斯」語（Romance，即R. languages，一種以拉丁語為母語的俗語，近代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語等均屬於這一語族）。12世紀以後騎士敘事詩非常流行，以至於將這些作品直接稱為「羅曼」或「羅曼斯」（法文roman，英語為romance）。這些傳奇故事大多假借歷史時代，但中世紀romance與希臘史詩之間的關係在西方一直是有爭議的。

8 西元3、4世紀至「中世紀」初期入侵羅馬帝國並導致其滅亡的「蠻族」，已經走出了人類的「童年時期」，他們的敘事作品是規模神話而成的韻文體英雄傳奇，或被稱為「民族史詩」，但已摻入了當時遍布歐洲的基督教觀念。這類作品可舉出8世紀英國的《貝奧武甫》，9世紀日爾曼的《希爾德布蘭特之歌》，12世紀法國的《羅蘭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等。

蕩下出現的散文體小說，大多是長篇體裁，連分明短篇規模的小說也要連綴成長篇的形式（如薄伽丘的《十日談》），歐洲典型的短篇小說要到18世紀以後才盛行。

由於沒有規制宏大的以「神話傳說」為內容、以「史詩」為形式的「神話—史詩」傳統，敘事詩落後於抒情詩的發達，典型的戲劇要到12、13世紀才形成，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的經驗在文學領域——包括在詞賦和文學散文中的積累，應該說是比較有限的。不過，在敘事藝術方面，中國古代另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那就是各種各樣的「史書」積累豐厚。漢初，中國最早的史書《春秋》已被列入「五經」，唐代的「九經」一下子增加了「《春秋》三傳」，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則被公認為「正史」的典範而為後世一再效法。而從先秦至魏晉六朝，史傳之外帶有敘事成分的散文體作品——各種雜史、雜傳，則大部分屬於史乘之流脈，即使被稱為「志怪小說」的魏晉六朝之「志怪書」亦為史傳之流衍⁹。《史記》等史書中的傳記篇目，為中國小說，特別是文言短篇小說提供了最基本的敘事模式。而正史的衍流，雜史、雜傳、志怪書等，漢魏六朝以來數量驚

⁹ 《穆天子傳》、《吳越春秋》等，神話傳說與歷史混沌不分，可謂之雜史；《燕丹子》、《東方朔傳》、「漢武三傳」、《曹瞞傳》、《名士傳》及《列仙傳》、《神仙傳》等可歸於雜傳；其餘從漢武時之《括地志》到晉張華《博物志》、從漢《異聞記》到晉干寶《搜神記》，其承襲史乘地理博物書、歷史雜記等也很清楚。劉葉秋曾說：「魏晉南北朝小說，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兩漢史傳的影響，實際是史傳的一股支流。」《魏晉南北朝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3頁。

人，它們由被奉為「正史」的史書派生而成，由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史傳」規範的束縛，發展出一種溢出史書的敘事態度和敘事風格，特別是在內容上不斷擺脫史書盡可能忠實於史事的要求，記以怪異之事和雜以不同程度的虛構¹⁰，表現出「小說化」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漢魏六朝以來大量的雜史、雜傳、志怪書，也可以說是唐代言言短篇小說的前導¹¹。在中國，所有積累敘事藝術經驗的載體，包括帶有敘事成分的詩賦和散文，都是語簡義奧的「文言」，且篇幅都不大，因此絕非偶然地使中國敘事文學之最高形式的散文體小說只能由文言短篇小說跨出第一步。另外一個與西方不同的地方在於，從史傳、雜史、雜傳、志怪書，再到小說，中國古代散文體小說需要完成一個從歷史著作到文學的轉變，而要完成這一轉變，使中國古代散文體小說蛻盡「史傳」的繭殼，必須等待歷史提供的「必要條件」，有了這個必要的條件，散文體小說才會真正成熟並成批的產生。

在中國，敘事藝術是經過長期積累，到唐代才成批出現在形式體制和美學品格上都達到散文體小說要求

¹⁰ 史傳也有虛構，但卻是在事實框架中的虛構。雜史、雜傳、志怪書雖然標榜求實，但所記之事往往依賴傳聞，則實在難以避免虛構，因為傳聞本身不可能沒有虛構，作者強調忠實記錄傳聞，也就忠實地記錄了傳聞中的虛構，而這種虛構又不同於歷史書在事實框架中的虛構，實際上甚至連「事實」本身也可能是虛構的。

¹¹ 這一點已有人言及，如程毅中說：「唐代小說主要是從史部的傳記演進而來，無論志怪還是傳奇，最初都歸在雜傳類。」《唐代小說史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12頁。

的作品，唐代以前敘事藝術的積累過程，則形成了中國的「小說前史」¹²。

7世紀出現並在8世紀末達到相當繁榮的中國唐代文言短篇小說，可以說是在世界範圍內最早出現的、符合散文體小說藝術規範的短篇小說，這比西方的散文體小說要早六、七百年。雖然唐初出現的一些文言小說作品，如武德時王度的《古鏡記》，貞觀時佚名《補江總白猿傳》及唐臨《冥報記》中的一些篇章，仍然可以看出其沿襲六朝志怪的痕跡，但「小說」意味已經大大增強。《古鏡記》表面看來是若干怪異故事的連綴，但其以運數為基本思想、以古鏡為線索的結構，試圖通過荒誕的故事表達作者家國淒涼之感的創作主旨，顯然已經不同於六朝志怪以「鬼之董狐」身份所作之或簡或繁的記事。《白猿傳》故事情節設置之機巧，描寫之委曲精工，比起六朝志怪中那些寫猿獾竊婦生子的篇什，亦有雲泥之分。至於7世紀後期高宗時張文成的《遊仙窟》，則已經盡蛻「史傳」及其衍流敘事之模式，創造性地提供了一個在短促時間內展示完整生活斷面的短篇小說的藝術範例。

大約在8世紀後期的貞元、元和年間，唐代文言短篇小說創作開始出現高潮。其突出的表現是優秀的單篇作品大量出現。從陳玄祐《離魂記》，沈既濟《任氏

¹² 何滿子、李時人：《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傑作評注·前言》（上冊）（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

傳》、《枕中記》，到李朝威的《洞庭靈姻傳》（《柳毅傳》）、許堯佐《柳氏傳》、白行簡《李娃傳》、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元稹《鶯鶯傳》、李景亮《李章武傳》、陳鴻《長恨歌傳》、蔣防《霍小玉傳》，可謂雲蒸霞蔚，傑構迭出。這些小說幾乎全被後世視為唐人小說中的經典作品。因為大多以男女情愛為內容，以致有人誤以為唐代小說「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而對其加以攻訐。實際上，兩性關係是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往往能夠直接反映出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的變化和社會關係的本質。小說與史傳的最大區別在於，史傳以記錄社會歷史進程為宗旨，而小說則主要從感情情緒及心理方面對社會歷史現象加以記錄和描寫，使文學不僅能夠反映生活，而且表現出不同於史傳的情感特徵和審美功能。唐代一些出色的以兩性情愛為題材的小說，正是突出了小說的情感特徵和審美自覺，並在中國古代小說興起之初，一下子將小說推進到一個相當高的水準。更何況唐人小說的題材並非僅限於情愛，即使是單篇小說創作的鼎盛時期也是如此。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以夢幻為題材，抒發的是一種人生、甚至是生命的感悟，同樣體現了小說的情感性。其他如李公佐《廬江馮媼傳》描摹鬼世界，《謝小娥傳》寫人間復仇；王洙《東陽夜怪錄》寫物怪；柳理《上清傳》牽涉到政治鬥爭，不僅題材內容豐富，而且文學的審美特徵也很突

出。

大約從大和開始，唐代文言小說從單篇轉入以小說集為主的創作。長慶末年，薛用弱《集異記》中二十餘篇作品已經全是成熟的小說。從此到晚唐產生的小說集至少有十餘部值得稱道：牛僧孺的《玄怪錄》有極為豐富的想像力，內容充滿了詭詭恍惚的奇幻色彩，敘事語言則鮮活俊逸，基本格調是對興趣的追求，並不以規戒為重，與單為述異語怪，未經有意識的審美處理，或藉以發明鬼神不誣的作品大不相同。李復言《續玄怪錄》的顯著特點是在志怪記異中深寓個人遭遇和生活經驗引發的憤激和感慨，主觀色彩和諷喻意味都很濃郁。大中間李玫的《纂異記》、咸通間袁郊的《甘澤謠》、乾符間裴鉋的《傳奇》亦是三部極富創造力的小說集。《纂異記》14篇作品大多把諷刺和批判的鋒芒凝聚在十分明顯的虛設故事中，謀篇佈局頗見匠心，且文采斐然，筆墨酣暢，風格十分鮮明。《甘澤謠》深寓作者的黍離之感、憂患之情，八篇作品奇而不流於怪誕，著意張揚人物異乎凡夫俗子的志趣、氣節和才能，融敘事、抒情、議論於一體。裴鉋《傳奇》三十四篇作品，皆為較好的小說，在短篇小說作家中可謂大家，無怪後世將其書名「傳奇」作為唐代文言短篇小說的代稱。作者喜好神仙道術，故其作品多敘神仙精怪之事，情節曲折多變，引人入勝，但與神仙傳記判然有別，重視的是對人的情感的把握。《傳奇》中的小說，詞采華美，形容酷似，